

## 生命政治

時間：2017年11月19日

主持：黃建宏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所長

主講：李澤廣 (Alex Taek-Gwang Lee) / 韓國弘益大學文化研究學系教授  
高俊宏 / 藝術家

### 李澤廣：

今天與大家分享的主題是亞洲生命政治的發展。首先，我的第一個提問是為何亞洲的生命政治沒有這麼迅速地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又為何亞洲在很多層面上仍堅持自己的傳統？這也帶出另一個問題，為何在亞洲的現代化、自由主義等浪潮，沒有讓我們締造出一個失敗的烏托邦？

傅柯 (Michel Foucault) 曾對現代主義提出非常有趣的理論，我想特別強調「現代性」此一詞彙，應該可以暫時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在座各位可能不認同自己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或認為自己是自由主義的主張者，但我們其實活得很自由。以我來說，可能在座多數都不會講英文，但我會，我不是以英文為母語的演講者，而是透過後天學習、教育及文化影響來學習語言。現代性一詞與語言沒有關係，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簡言之，現代性所指的便是食衣住行等面向，如吃東西的方式、建築搭建的方法等，同時現代性也凝塑我們對某些事物的想像。我曾看過臺灣有非常道地的電子花車表演，這在韓國也有，是項非常有趣的現代性特質。我看過電子花車紀錄片拍攝到的電子花車裝飾背景，有些是來自異國如巴黎艾菲爾鐵塔、義大利比薩斜塔等，所以觀眾不用真的去其他國家，只需看這些裝飾就能知道。這也是為何當你去巴黎參觀艾菲爾鐵塔時會說：「這真的是艾菲爾鐵塔」，因為你之前就看過了。這就是現代性，也是傅柯批判現代性所創造的同質性。他認為現代性大幅改變了現代人的生命，並定義造成此現象的根源來自於新興權力的崛起，一是規訓的權力，一是生命的權力。

規訓及生命的權力其實是一體兩面，傅柯創造此理念時援引馬克思 (Karl Marx) 的說法，馬克思提及工業化時代裡，工廠的工人被馴化在固定時間內打卡上下班，與務農時期的作息差異極大，而工人也將此種作息內化成生命的一部分，若有天沒去上班，反而可能覺得不自在。這可以解釋成兩種形式的權力，一是來自政府規訓的權力，是由上到下；二則是由下往上的生命的權力。在傅柯定義下，可以看見在亞洲國家與現代性隨之而來的，是無所不在的監控。監控的本身就是規訓的過程，讓人可以臣服於規訓的權力之下。

對於監控如何規訓個人行為，傅柯以圓形監獄為例，說明權力如何作用於個人身

上。其實這個概念最早是由邊沁 (Jeremy Bentham) 提出，他是功利主義的先驅。功利主義強調社會的每一份子都應感到社會給予的愉悅，因此你應貢獻一己之力，強調兼愛，而非一味的自我放縱，否則便會被懲罰。代表現代性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不僅運用在監獄，也運用在醫院建築上。18 世紀以前的人們看待罹患精神病的人，認為他們是上帝創造來向世人顯現人類另一面不同的面向；直到 18 世紀以後，才將精神異常的人視為身體有疾病的人。當時對於人為何會發瘋，認為是因為他們無法抑制自己的渴望及心智，便處於成為瘋狂人、野蠻人的邊緣，對於 18 世紀自認為處於文明世代的人們而言是非常危險的，因此必須建立如同監獄般的精神療養院，試圖規訓這群人。

於此同時，歐洲哲學家便推動自由主義，在當時這波思潮仍屬於政治學的範疇。推動自由主義的三大巨匠分別為霍布斯 (Thomas Hobbes)、洛克 (John Locke) 及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雖在政治見解上各有差異，但最終皆是希望推動民主，推動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

接著要講「治理性」。治理性對於傅柯而言，就是現代性的一種表現。規訓及懲罰就是現代性的核心。這裡所指的治理性，並非單方面地由上到下，由獨裁者決定的治理，而是雙向的，由人民決定他們的領導者是誰，換言之，也就是民主。

在歐洲崛起的自由主義思潮，到美國後便影響當時的獨立戰爭，但自由主義在 19 世紀後遂漸沒落；第二次新自由主義浪潮的興起，則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波新浪潮發展的最初，學者以 18 世紀自由主義面臨的瓶頸為鑑，包含休謨 (David Hume)、亞當·斯密 (Adam Smith) 與彌爾 (John Stuart Mill) 等人，提出以貿易、經濟面向為主，認為這便可解決 18 世紀面臨的危機。這批經濟學者的盲點在於認為人是有良善立意的，斯密便認為市場會由看不見的手來自行調節，相信人性本善，不會惡意擴張；但事實並非如此。後續便有學者反對人性本善的主張，其中最為知名的便是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他提出人性是中立的，無善亦無惡，將經濟發展交給人性，很容易出問題，因此提出人口發展的準則。與此同時，社會達爾文主義崛起，這個思潮原屬於社會科學的研究，但在史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援引下，他將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物種演進的概念運用在社會學，用演化論的觀點看待社會的變遷及發展，提出社會上適者生存的概念。

回到最初的提問，為何亞洲許多人都非自由派？我有兩個主張，一是因為自由主義已被後來崛起的達爾文主義所取代；二則是因為亞洲當時是友善地全面擁抱生命政治。這裡我要介紹一位我很喜歡的中國學者梁啟超，他當時非常深入地研究自由主義。另一位有巨大影響力的學者則為嚴復，他是第一位到英格蘭深造的學者，學成歸國後在上海 YMCA 開課教學，吸引許多知識分子聽課。不同於梁啟

超作為自由主義派的學者，嚴復在課堂上運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解釋中國的起落興衰。

張浩對此提了非常現代性的解釋，他認為嚴復之所以對西方價值觀感興趣，是因為這樣的價值觀為西方帶來充滿活力與奮進價值的能量，而他相信中國正是缺乏此種價值觀與競爭力才會積弱不振。亞洲正是透過生命政治才有了現代性，而非透過外來殖民所產生。正因如此，亞洲對於新自由主義而言是非常友善的地方，一開始就接受了生命政治，從 1970 年代以後，可以看見歐洲經歷資本主義的危機，也可看見許多思維是以數字作為思考的重點。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之下，他們試著用管理的方式來將人類視為資本，控制人類，甚至控制人類的心智，而這逐漸成為新的典範。獨權的興起便象徵著新型態自由主義的崛起，這樣的影響將延伸至日常生活中，對我而言，首爾到處可見的整形廣告，這就是美成為商品化的過程。1990 年代醫生仍將這種手術稱為美容治療，而非整形手術，國家也將之納入健保給付的一部分。而整形與美容治療的差異在哪裡呢？詞彙轉變所帶來的意義是，使用整形手術一詞代表將其視為高度的醫療診治，一旦美需要藥物治療，就意味著醜成為一種疾病。整形代表著生命政治的極端型態，照護產業即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照護產業要求每人都有責任好好照顧自己，這也是新型態的生命政治。另一個則是自我管理，我稱之為「幸福的意識型態」，也就是你要採取行動做好自我管理，才有可能獲得幸福。在追求幸福的意識型態下，不快樂就代表你出了問題，必須要採取行動降低痛苦，才能享受人生。

我認為這就是文明社會的黑暗面，你被逼得不得不追求更好的人生，最終卻獲得暗黑烏托邦，若你沒有做到，你就是魯蛇。生命政治其實就是現代性的一種情況，大家都經歷現代性的洗禮，無處可逃，也無法回返到過去。但我們要如何抗拒生命政治，我用具有雙重概念的「subject」一詞，意指有自由意志的對象，你可以選擇逃離既有的體系，主體化即逃離現有的宰制。主體化即個體可不受意識型態影響，不受任何族群、地位、社會團體等影響，具有逃離宰制的能動性。我們要如何逃離生命政治？或許透過《抄寫員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 以及《星期五》(*Friday*) 這兩本小說，可以來假設我們有一個島能夠代替被生命政治影響的生活型態，透過島嶼來探索另一種可能。我認為，的確可能透過新的創造來脫離被宰制的狀態，形塑新的觀念。

**高俊宏：**

今天的內容會緊扣「非人」議題。「非人」並非古典的議題，它其實非常當代。怎麼說呢？比如最近原住民在凱道進行社會運動時的口號「沒有人是局外人」，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可以說是社會運動的訴求，從生命政治的條件來看，真的沒有人可以是局外人。我們到底該如何面對大家都在局內的困境？

從我作為藝術創作者的立場來說，考證「人是什麼東西」是我的第一步工作。人是什麼東西？從我的地理考究方法來說，我會回到這座島嶼早期原住民族群所經歷非常怪異的現代性轉變。這個現代性的轉變來自於日本殖民初期透過兩種方法論，一種方法論叫法學，比如 1903 年總督府的法學家安井勝次定義的原住民是「非人類」，他認為原生的人是飛禽走獸，無異於動物，這是從「法」的角度來說；第二個方法論是人類學，透過從 18、19 世紀西方人文主義所發展，把所謂的自然科學、物理學統整出一個通往人類學、心理學的架構。人類學的架構是把觀察者跟觀察對象做劃分的界線，早期臺灣原住民是作為一種自然物如同植物石頭般的分類法，被放置進帝國人類學家的脈絡裡。

我自己創造一個字叫「Artistorical」，是「Artistic」跟「Historical」的合體，這其實是帶有藝術性及歷史性的方法。過去我們認為這兩者之間沒有交集，甚至是有隔閡的狀態，但我這幾年發現，當藝術創作觸及所謂的當代主體時，不論是剛才提到的新自由主義，或是更粗暴、粗糙的民族主義問題時，其實就必須涉入歷史性的探究跟歷史性的方法。這個方法如何跟一群消失、瓦解的族群做協商，這是我所想思考的議題。

進入今天主題之前，想先提我近年來的兩件作品，跟空間生產、歷史主體都有關係。作品《樹變圖》的背景，是我十年前因為身體沒有很好，就開始往山裡走，走走就發現廢棄的空間。這些廢棄的空間大約都以 1980 年代作為斷代。當時我跟阮慶岳等藝文工作者談過，臺灣在 1980 年代很奇怪地出現了很多廢棄的空間，為何廢棄空間會密集出現在 1980 到 1990 年代初期？背後的經濟變動到底為何？我們討論分析後發現它跟新自由主義、競爭、降低成本有關，所謂的社會體在當時某種程度是解體的，有著產業外移、工作倫理逐漸崩毀的情況，也因此造成許多廢棄的工廠。

我的第一個階段就是針對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所留下的證據——「空間」所展開。當時運用的方法是，既然沒有人作為局外人，但你如何逃離這個局？我在想的一個關鍵字就是「鬼魂」，不如就讓鬼魂出現，並且使用很怪異的、反現代性的呈現方式。我們可以觀察幾乎臺北的火車站附近幾乎都會有遭到臺汽客運廢棄的空間，很多變成樂園，被財團買下，過去很多空間都是官股，也是所謂的公共空間。當時我們用影像、繪製、老照片的方式，用人文的方式去放大曾經在這些空間的鬼魂或者是事件。

另一個是兩年前所做的《博愛》影片，這部影片延續廢棄空間的議題，只是它的

區域更限縮於四個地方。當時我比較密集地在四個地方拍攝，包含博愛市場、新店安康接待室、海山礦坑，以及臺汽客運廢棄的工廠。像是安康接待室，它是 1973 年由調查局祕密建成，其實是用來拷問的監獄，為何我會拍這裡？這跟圓形監獄的概念不同，它是非常古典、封閉式的監獄，犯人、獄卒彼此看不見對方，空間不具開放性。這裡在 1987 年就結束了，讓它敞開的，是臺灣當時追求全面解放、全面自由的社會。

基本上《博愛》並非在一個空間做室內或是空間性的繪製，而是加入一些敘事以及拍攝的影像，並回到影像現場投影的行動。對此，這接近臺灣電影學者孫松榮曾提出的一個概念「遷徙電影」，亦即移動電影。

進入今天主題。在座應該沒有人聽過大豹社吧？我為何會做這個計畫？是因為我小時候就在大豹溪游泳。那條溪是全臺灣溺水率最高的，曾經有 44 個溺水案件，所以那條溪我們都叫它鬼河。國小的記憶在長大時迴返，也讓我開始好奇為何大豹社整個族群會消失不見。

過去舊的大豹社部落，現在已經是一座溫泉渡假村，這塊地經歷很多次變動，這與日治時期的三井合作會社，以及國民黨成立的臺灣農民公司有關。當時三井合作會社準確地測量了這座山，後來轉手賣給臺灣農民公司；2000 年前後，臺灣農民公司大量拋售給許多立法委員跟議員。這些都是歷史背景。

我的工作是思考空間生產的問題。我其實沒學過任何科班的歷史方法，也不懂要去哪裡找資料，但這件事非常震撼我，它看起來是個歷史片段，但卻一直影響到今天，我認為這是非常當代的主題，所以覺得自己是在做微戰爭遺址的測量、挖掘與再現的工作。假如是歷史學者，一定會以人、事、物的結構來書寫一個事件，但從來沒有人從空間的角度來寫歷史；如何將感知（perception）變成檔案，如何把檔案變成國家協商的物件，這是我在做的，今天也跟大家分享這個工作現在累積到什麼階段，以及未來會處理哪些議題。

臺灣曾經有島內島的說法，意思是對日本政府來說，有一區是無法測量的區域，是國內的國外。從 1898 年《臺灣堡圖》的其中一套可以看出，面對山的邊界時，測量的技術其實是進不去的，因此讓地圖留下很大一塊的空白地帶。這個空白地帶、這條線，一度被稱為隘勇線，曾經這是個聽起來很古老的名字，今天聽來卻有種借屍還魂的狀態。今天我們對島內、人跟人之間，其實還是存在著某種分界線。那條線的意思是什麼？從隘勇線的系統來看，日本帝國的隘勇線是地理空間的分界，是沿著山顛、稜線的邊界；第二個層面是文化的邊界，因為跨過這條線就是蕃人的世界，是被認為沒有文明、非人的世界；第三個層面是國家的邊界，從兒玉源太郎時期推動隘勇線所延續的脈絡，某種程度也是日本帝國邊界的推進；

第四個層面則是人類學的邊界，漢人用「山猴」來形容原住民。隘勇線前進就是我目前在理解的龐大系統。因為在山裡行走的經驗，也讓我慢慢發現在臺北南邊的山區裡面，曾經存在著不同的線，這意味著戰爭武裝的線，也意味著這是一步步推進跟切割原住民族的線。

重新走這些路線包含要同時進行考據跟證明。記得林克孝在《找路》一書提到，找路就像盜墓者，要會判斷所有東西是否合理，因此很多跡象就是在走路的過程去判斷、累積，比如山邊的刻痕、石階，維護的證據等等，慢慢很多大證據也出現。

這裡我要特別釐清自己的工作方法，雖然我借用早期人類學家、博物學家的帝國式考察，採取遊走、逐點式的考察；但我的方法是反過來，也會面臨跟林務局、原委會還有文化部等公部門的談判。

簡單來講，這些分布在臺北山區的構造物是戰爭留下的某種檔案；這些戰爭檔案的重點在於地標、繪製，重新找出新的圖。我仍將自己的工作視為空間生產，而非歷史生產。空間生產包含素描，以及後續的文化行動等等。

最後做個總結，當我們試圖脫離現代主義的再現系統來思考當代藝術時，有一個很困難的點是，我們如何與社會有所聯繫。這十年來臺灣藝術生態有一個轉變是，慢慢轉向社會領域的議題；但弔詭的現象出現了：到底是藝術需要社會，還是社會需要藝術？我認為常常是藝術需要社會，所以才靠近社會議題。這是我的自我批判。我也瞭解藝術創作者的能力很有限，要如何才能真正地與社會交往、溝通，會是個問題。不論是大豹社事件所連結的歷史背景，或是剛才李教授所提的新自由主義議題，都持續與當前我們面臨的困境有所關聯，我認為這些是我們無法迴避的課題。而我是選擇從消失的族群這個角度切入，來理解比較大的非人、生命政治的問題。